

浙禾金石圈与全形拓的肇始

陆蕾平

内容提要：本文借释疑徐康全形拓起源说，解答了道光初年全形拓从萌发到流行的诸多问题，指出了全形拓的早期发展是出现于嘉兴（浙禾）金石圈的群体现象；并讨论了道咸时期，嘉兴地区成熟的金石研究成果包括全形拓技术如何影响至吴门以及其他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徐康在阐述全形拓起源时的用词非常讲究，“浙禾”是个地域概念，而“吴门”却是个画派概念，直指金石之学对中国书画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全形拓 浙禾 吴门 马起凤 徐康



图1 《金石屑》载汉洗拓本

但凡研究全形拓，尤其是六舟者，都绕不开《前尘梦影录》的作者徐康^[1]对全形拓起源及传承的一段叙述，其曰：“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曾为吴子苾、刘燕庭、吴荷屋、吴平斋诸老前辈所赏识。”^[2]《清稗类钞·鉴赏类》沿袭了徐康的说法：“马傅岩，道光初年之嘉兴人。吴门椎拓金石之人，向不解全形，傅岩能之，释六舟得其传。……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则得之六舟者。”^[3]又见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彝器拓全形，始于嘉庆马起凤，金石屑（一：卅三）录一汉洗，马氏题云：‘汉洗，旧拓本，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戊午乃嘉庆三年也。”^[4]（图1）这里，容庚把戊午年误识为嘉庆三年，所以不了解马起凤生卒年的各路学者皆是承续此说，认定六舟的全形拓方法传承自马起凤。

直到2015年，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先生发表了《马起凤藏〈永安琴砚〉拓本》^[5]一文，揭秘了马氏的生卒年（1800—1862）。同年“泰和嘉成书画·古籍常规拍卖会”的拍品《钟官图》上题

[1] 徐康（1814—1888），字子晋，号窳叟，长洲（今江苏苏州）诸生；工诗、画，篆、隶、刻印，靡不研究，尤精鉴别书、画、金石；杨藐翁（岷）以宋荦称之；著有《前尘梦影录》《神明镜诗》；兼通岐黄。

[2] （清）徐康撰：《前尘梦影录》下，第21页a；《续修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750页下栏。

[3] 徐珂编，无谷、刘卓英点校：《清稗类钞选：著述 鉴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

[4]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5] 仲威：《马起凤藏〈永安琴砚〉拓本》，《收藏》2015年第3期，第103—104页。

有马起凤款识“咸丰庚申上元日清逸老农马起凤时年六十有一”，此印证了仲威先生的说法。如此一来，《金石屑》所载马起凤《汉洗旧拓本》^[1]所题之“戊午年”就不是嘉庆三年（1798），而是咸丰八年（1858），其传拓时间的优势骤然消失殆尽，其年龄甚至比六舟还小九岁。赵阳先生于2018年初发表了《马起凤与早期全形拓》，其中断定“马起凤传拓全形的时间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六舟传拓铜器的时间要比马起凤早”^[2]，实则已是否定徐康之说。

问题是，徐康真的错了吗？为何容庚的一个年代考证之谬会反推至怀疑徐康的叙述呢？《前尘梦影录》是徐康在光绪十一年（1885）养痾旧山楼时所写，其时徐氏七十二岁。而道光初年，他不过十岁左右（徐康比六舟小二十三岁，比马起凤小十四岁），故这段历史是来自其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时隔多年，是徐康的记忆发生了偏差吗？六舟与马起凤，前者无论是年龄还是声名，都大于后者。加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马是相对比较宅的人，其行踪似乎都以家乡嘉兴为中心。如果徐康记载傅岩师从于六舟，可能更符合逻辑，后人并不会怀疑；可为何他偏偏写一笔“六舟得其传授”呢？唯一的解释即这就是事实，而徐康应是对此印象极为深刻。

徐康的这段话除了述及早期全形拓的先行者们，还涉及两处地区名：浙禾与吴门。此处“浙禾”，即“嘉禾”，今嘉兴地区^[3]；吴门，则指苏州一带。当我们从吴门中人徐康的立场来看，其对出现了马起凤、六舟等一批全形拓能手们的浙禾，实则满怀钦羡：“吴门推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其言下之意，即浙禾人士在全形拓这一领域，要领先于吴门。的确，早在道光初年，以张廷济^[4]为首的浙禾金石学家们于其金石交游中，少不了一个关键词：全形拓。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全形拓？是马起凤？还是六舟？或是另有其人？这段全形拓起源史，一直以来疑云重重，众说纷纭。笔者在研究《汉建昭雁足铎拓本》的过程中，倒是不经意地接触到了诸多线索，从而发现了一批来自浙禾地区早期全形拓的善拓能手。

一、马起凤与钱寄坤

马起凤（1800—1862），字傅岩，原名宗默，后改为起凤，号山父、梦舟，浙江嘉兴人。容庚在介绍到马起凤时，曾附注一笔：“今马氏拓本，除金石屑所载外未见他器。”然而近年来借着六舟的东风，随着各界对释达受六舟的关注，其“师”马起凤也备受青睐，各种拓片及相关文献相继冒出来。这令我们得以比容庚先生所见更多的素材来研究这位神秘的全形拓先驱者。

除却仲威先生所研究之《马起凤藏〈永安琴砚〉拓本》，新浪博主蝶庵先生也注意到上海朵云

[1] （清）鲍昌熙：《金石屑》，第1册，第33页；《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6册，第4612页。

[2] 赵阳：《马起凤与早期全形拓》，《中国美术》2018年第1期，第142—153页。

[3] 嘉兴，自唐朝起就有“嘉禾”之称；清嘉兴府辖嘉兴、秀水、嘉善、海盐、石门、平湖、桐乡，当时海宁（六舟出生地）归属杭州府，不过今天海宁市属嘉兴市下辖的县级市。

[4] 张廷济（1768—1848），原名汝林，字顺安，号叔未，一字说舟，又字作田，又号海岳庵门下弟子，晚号眉寿老人，浙江嘉兴人。嘉庆三年（1798）解元，以后几次会试未中，索性弃仕从文，专心学术研究。其精金石考据之学，尤擅长文物鉴赏。喜收藏各类古器文物，上自商周下至近代，以鼎彝、碑版及书、画为多。著有《金石文字》、《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清仪阁金石题识》、《清仪阁古印偶存》、《清仪阁题跋》、《清仪阁印谱》及诗钞、《眉寿堂集》、《桂馨堂集》等。阮元督学浙江时对其极为推重，来往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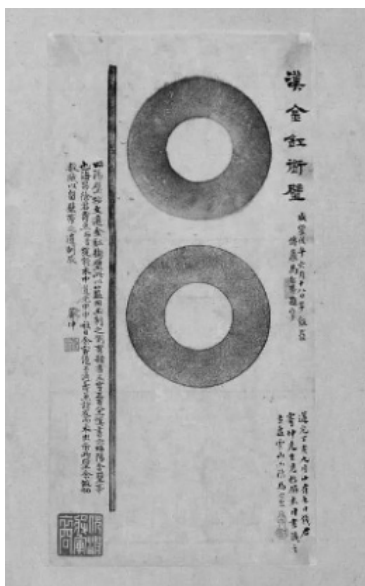


图2 钱寄坤拓《汉金缸衔璧》
(朵云轩2004秋拍)

轩与马起凤有关的几件旧拍品。其中之一即为2004秋拍“古籍善本专场”中的0457号拍品《周汉吉金全形拓器》拓本二轴^[1]。该标的第一轴是《汉金缸衔璧》(图2)，左侧有钱寄坤^[2]题跋曰：

昭阳璧，按《文选》金缸衔璧。此以蓝田玉制之，侧有隶书五字“三百八十一”。《汉书》云，昭阳含璧带也。海昌徐君寿鱼绍曾获于禾中，道光四年甲申(1824)秋日余客沪上，适寿鱼访友而来，出示此璧，余假拓数纸，以留璧带之遗制欤。寄坤。^[3]

右下为马起凤跋云：

道光丁亥(1827)九月廿有七日钱君寄坤先生见贻拓本，因书识之。古盐云山小隐马宗默。^[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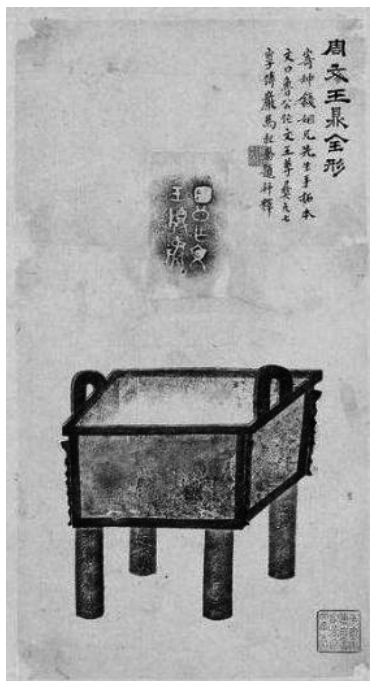


图3 钱寄坤拓《周文王鼎全形拓》
(朵云轩2004秋拍)

由此得知这是钱寄坤于道光四年(1824)所拓，马起凤于道光七年(1827)作跋，类似于做个笔记，应该就收起来了。然而我们注意到“汉金缸衔璧”题端的下方，另有两行：

咸丰戊午六月十八日早饭罢，傅岩马起凤题字。^[5]

又见戊午六月十八日，这一日，不是与《金石屑》中汉洗拓本题记同为一天吗？没错，马起凤的确如是题曰：“汉洗，旧拓本，戊午六月十八日，傅岩马起凤并记。”“旧拓本”又“并记”，可见当时重新所“记”的不是一件两件。这轴《汉金缸衔璧》当为与《汉洗》同日并记之一。这说明，看似难度不太高的汉洗全形拓并不是咸丰年间的作品，很有可能是道光初年的。

同为一个标的的第二轴《周文王鼎全形拓》(图3)，亦有马起凤跋曰：

[1] 姚涌进(蝶庵)：《五月(上)：五月十五日》，新浪博客2016年6月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1c13520102wff7.html。

[2] 钱寄坤(1767—1836)，名以发，字含章，浙江海盐人，钱柞溪之次子，善研辨书画金石文字，兼工篆刻。

[3] (清)钱寄坤：《汉金缸衔璧》题跋左，朵云轩2004秋拍。

[4] (清)马起凤：《汉金缸衔璧》题跋右下，朵云轩2004秋拍。

[5] (清)马起凤：《汉金缸衔璧》题端下跋，朵云轩2004秋拍。

周文王鼎全形。寄坤钱姻兄先生手拓本，文曰“鲁公作文王尊彝”，凡七字。傅岩马起凤题并释。^[1]

可见上述二拓，都是海盐钱寄坤所拓。观《周文王鼎全形拓》，技艺亦是不俗。马起凤称其为“姻兄”，是为亲戚，关系匪浅。实际上钱寄坤年长张廷济一岁、长马起凤三十三载。其父柞溪翁为海盐名贤，精鉴书画碑版，亦事藏弃，于藏经纸尤有独诣。^[2]寄坤家承古风，好古擅拓。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跋》有载钱氏生平：

……此二全拓海盐友人钱兄寄坤所贻。寄坤长余一岁，为柞溪翁之次君，鉴古能其学，素心，脱赠，是可感也。柞溪翁名本诚，字仲寅，年至八十六道光元年卒。寄坤名以发，字含章，今年七十于九月五日道光十六年丙申。^[3]

张廷济于《怀钱寄坤》诗序中，追溯了二人四十余年间的往复道古之交：

钱兄寄坤，名以发，字含章，行四。海盐人，住南门内观音堂前，柞溪翁本诚之子，善研辨书画金石文字，兼工篆刻，为人重然诺笃友谊。乾隆六十年乙卯四月十五日，余于海塘渔舍，买得汉永宁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于氏作奉在立之全甗，持至文鱼兄石鼓亭中，始与寄坤相识，计四十二年中，往复道古，不可殫述。道光丙申年七十，八月中余犹属受之侄辛，持玉旌帖已请赏，詎知九月五日竟作故人耶。^[4]

以上二则文字虽短，却尤为重要，略补钱寄坤信息阙如。但在全形拓的师从问题上，钱寄坤与马起凤孰师孰徒，仍不足以考。道光四年，马起凤二十五岁，年轻倒不是问题。奕志二十一岁时全形摹拓技法已比较娴熟，更有张辛（受之）二十岁时已能为“周诸女方爵”作整楮全形精拓。在掌握全形拓技法的问题上，相比经验，更需要有西方写实主义的素描技法，更强的学习能力、变通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在这一点上，似乎年轻人更有优势。不论孰师孰徒，从上述钱寄坤赠



图4 马起凤拓《周尊全形拓本》
(泰和嘉成2016年春拍)

[1] (清)马起凤：《周文王鼎全形拓》题跋，朵云轩2004秋拍。

[2] 范景中：《纸尾草》，《藏书家》，齐鲁书社编：《藏书家：合订本11—16辑》上，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7页。范景中先生于该文录有《跋旧抄本〈籀史〉》一篇，著录乙未正月中浣柞溪手抄《籀史》一册，并作柞溪小传：“海盐钱惟寅……柞溪字惟寅，名本诚，住海盐南门内观音堂前，工楷行书，老而弥笃，精鉴书画碑版，和易坦率，喜掖后进，卒年八十六。事见《清仪阁题跋》。柞翁亦事藏弃，于藏经纸尤有独诣。张芑堂《金粟笈说》中有记述。”

[3] (清)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跋》卷3，清光绪十八年（1892）石埭徐氏观自得斋刻本，第29页b。

[4]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感逝诗》，据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清仪阁藏版刻本影印，第24页；《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91册，第780页上栏。



图5 李锦鸿绘商王父丁尊全形拓底稿（左）、章甫绘毅卣全形拓底稿（右）（西泠印社2015春拍）

拓于马起凤的行为，我们看到其二人于道光四年在全形方面已有所交流，更是在其拓片题端中以“器物名+全形”之法来命名，例如“周鲁侯角全形”“周文王鼎全形”。

细观此两种拓本，马起凤《周尊全形拓本》（图4）中的拓像，除颈处纹饰拓自原器外，其余皆是用与六舟一样的“纸漏子”式纸版拓法：器形清晰，无轮廓线，墨色均匀。至于钱寄坤《周文王鼎全形拓》，鼎面与足应取拓自鼎身，但深色边框像是通过制版后取拓而得的。



图6 马起凤拓《周鲁侯角全形拓》（泰和嘉成2016年春拍）

郭玉海先生在《响拓、颖拓、全形拓与金石传拓之异同》一文中说道：“在传统的碑帖收藏与鉴定领域里，古今金石拓片，特别是石刻拓片，尤重考据，凡有一笔勾摹者，即为作伪，这是一个十分严格的界限。”^[1]但此说法主要是针对碑帖、铭文、纹饰的传拓。全形拓是一种介于椎拓和绘画之间的器物图像复制法，在制作过程中，绘画是必不可少的步骤，绘画功底也是必备的能力之一。西泠印社2015年春季拍卖会“吉金嘉会——首届金石碑帖专场”中有两件李锦鸿与章甫所绘的全形拓底稿（图5），或有助于我们对早期全形拓的步骤有所了解：先有外形的白描定位底稿，然后再通过传拓来上墨。即便是不同的操作者，传拓方法各异，但这一步骤都是必经之路；今天的全形传拓者们，亦无法避免。

马起凤的全形拓除了《周尊全形拓》外，尚有一件其多次跋于咸丰九年己未（1859）的《周鲁侯角全形拓》（图6）。这是件相当成熟的全形拓，与其手拓“周尊”的技法完全不同。爵身以淡墨蝉翼法拓出，唯腰际处与鬲施以重墨。其结构准确，细节讲究。角流与尾的向外翻折处与鬲上的纹样都没有错过。相比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所载四件商爵与前文提及的其所藏周爵之全形拓本，傅岩版的周爵全形在造型表现上更加整体连贯。拓像中，爵身呈现出丝丝缕缕如蝉翼筋络般的短促线条，足上并没有。赵阳先生分析这是拓前未除锈所致^[2]，然锈

[1] 郭玉海：《响拓、颖拓、全形拓与金石传拓之异同》，《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1期，第145页。

[2] 赵阳：《马起凤与早期全形拓》，第145页。

斑并不以丝状而是以点状漫开直至呈片花状。笔者以为，这是拓纸为紧覆于爵腹与流之圆弧转折时所形成的折痕。

由于马起凤并没有确切地将拓器时间问题记于拓本之上，又缺乏其更多的全形拓作品来佐证，故我们无法知其不同时期的风格与技法的差异。此周鲁侯爵与周尊的传拓技法相异，亦有可能是由于器型的差别，令施拓者做了不同的选择。然而通过其现有公私藏中传世的数件拓本，包括前文述及与未述及的拓片与题跋来看，他喜欢反复地翻阅以往的旧拓，尔后反复题跋。其嘉禾金石友王逢辰^[1]显然对傅岩有同样的印象，其于同治四年（1865）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永安砖琴砚〉马起凤拓本》（图7）的卷轴下方这样题记道：

近时为余之金石交，而酷爱古甄古瓦文者，如南屏六舟上人达受、福安李芑园司马枝青、桐城吴晋斋大令廷康，并藏有秦漠瓦当、汉晋甑文不下数百千种，吾里张叔未解元廷济以及余家所藏，亦足以与诸公匹敌。海盐自张芑堂征士燕昌之后，惟马君傅岩上舍笃嗜之，尝以手撮古甄瓦文出示者，约有五六百种之多，虽拓本中真伪不甚选择，且见每拓必多题识，随手写来，或诗或考，竟不自惮其烦，然其好古之心孜孜不倦，真不可及也。^[2]

随手一撮，即有五六百种之多，难以想象，马起凤的拓本藏量究竟有多少。按王逢辰的说法，傅岩所藏的古砖古瓦拓本远超过他与张廷济的库藏；更关键的是其“每拓必多题识”。例如《周尊全形拓》，其于道光庚子（1840）七月十日拓完并题，越二十年后（1860）又翻出来作释文：

举父辛，庚申年白露日傅岩释。^[3]

又如《周鲁侯角全形拓》，虽然拓时所题未落年款，可是咸丰己未年（1859），其两次复题。一次是在己未长至前三日，于家中“清逸山房夕阳窗下”手录《嘉善黄霁翁观察应嘉兴方莲



图7 《永安砖琴砚》马起凤拓本（上海图书馆藏）

[1] 王逢辰（1802—1870），字玉荫，号芑亭，浙江嘉兴竹里（今嘉兴新篁）人。廪贡生，官候选训导。工诗文，善画兰。嗜金石，家藏鼎彝古器甚多。其居曰“槐花吟馆”“秦瓦晋砖之室”。著有《竹里秦汉瓦当文存》等。参见《嘉秀近代画人搜铨》。

[2] （清）王逢辰：《〈永安砖琴砚〉马起凤拓本》题跋下中，上海图书馆藏。仲威：《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第210页。

[3] （清）马起凤：《周尊全形拓》题跋左，泰和嘉成2016年春拍。

卿司马赋》：

爵形无柱认来真，制器应同尊簋陈。吾与君为歌燕喜，历阶扬解是何人。颇想亭斋倒酹醪，醉魂可许丐余馨。只惭识君牺蒙辨，画肚沉吟十六铭。^[1]

其书从行书开始，越往后越草，至第五行已成小草书。半年后，于冬至前三日，他又抄录了张廷济早年题在该爵另一张铭文拓上的跋语：

角与爵同，而无柱。此角藏吴门缪氏，三十年前桐乡金云庄比部拓以见贻，武林许东生带至嘉兴归郭止亭^[2]，今归方莲卿司马^[3]。积古斋据摹本故入簋。余与徐籀庄俱另有考释。道光癸巳（1833）冬日，嘉兴叔未张廷济并识。^[4]

或许傅岩恰好读到这些释文和跋语，觉得与自己所拓金石相关，随手就记上了。可见其行事之率性，于好古之痴嗜，令时人为之惊叹。

《永安砖琴砚》拓本上，其自题即有三通，除了道光丁酉年（1837）拓后首题之外，其于第二年，以及二十二年后进行了再题与三题。第三次也是在咸丰己未年夏天，与他再题《周鲁侯角全形拓》时间相仿。又如《钟官图》（图8），其首题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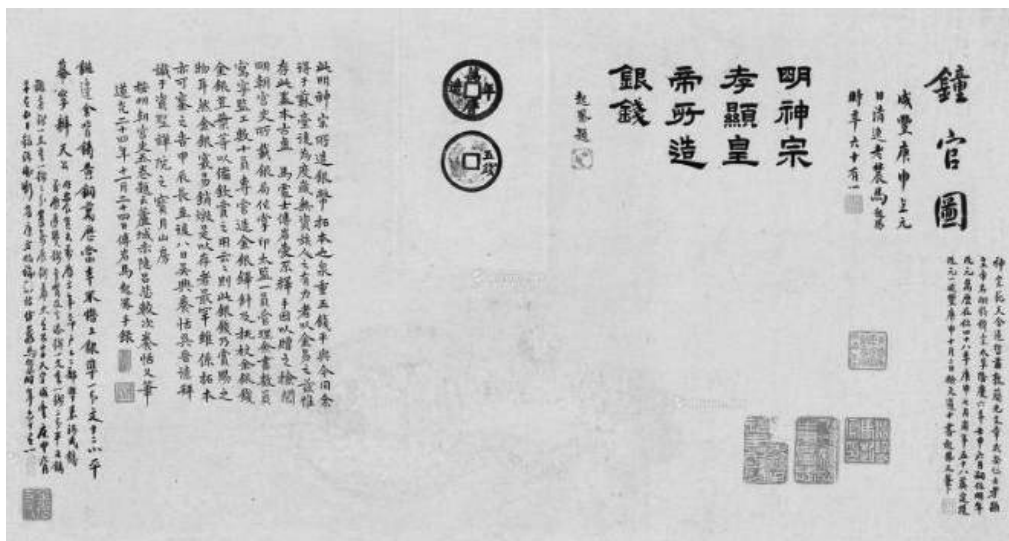


图8 马起凤拓《钟官图》[2015泰和嘉成书画·古籍常规拍卖会（一）]

[1] （清）马起凤：《周鲁侯角全形拓》题跋右下，泰和嘉成2013年春拍。

[2] 郭承勋（约1796—1860），号止亭，又号定斋，别署嘉兴老农，浙江嘉兴人。书画家，篆刻家。善治印，宗浙派，又能画，曹山彦尝为刻“画禅”一印。参见郭容光：《艺林悼友录》，《近三百年嘉兴印画人名录》。

[3] 方惟祺，号莲卿。兰谿之从弟，候选同知。亦从高爽泉学书，平生嗜金石，收藏甚夥，兵乱后，皆星散矣。参见郭容光：《艺林悼友录》。

[4] （清）马起凤：《周鲁侯角全形拓》题跋左，泰和嘉成2013年春拍。

二十四日其手录吴晋德于该年长至后八日所写的“明神宗孝显皇帝所造银钱”的考释；后三次皆在咸丰庚申年，分别是上元日、九月二十日、十月二日。为了使该长卷生动活泼些，傅岩每次题跋都以不同字体书之。横卷画心下方留出大片空白，仿佛等待新题跋的书写。“可惜今傅岩归道山矣，而古时甄瓦之有文字年号者，各处盘遭兵火，十不存一，可为浩歎。”王逢辰于《永安砖琴砚》拓本上写下这段文字时，想必也是扼腕唏嘘至极。

其实以上一再强调马起凤喜好翻检旧拓来题跋，是为了说明《周鲁侯角全形拓》的后两通题跋与其拓器时间，并非一定相同。坊间认为这件全形拓代表了马起凤晚期的传拓风格，其实并不能就此断言。我们注意一下其题记落款为“傅岩马起凤题于鸳鸯湖畔舟次”，而《周尊全形拓》的题记落款为“道光庚子（1840）七月十日海盐傅岩马起凤假拓于鸳鸯湖畔姚氏之宝甌堂中”^[1]。另见上海朵云轩1999秋拍中一件《鉴拓》（图9），其上马起凤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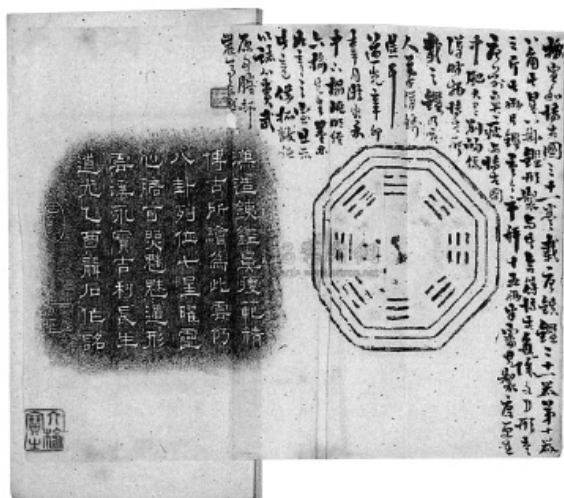


图9 马起凤拓《鉴拓》（朵云轩1999秋拍）

按《宣和博古图》三十一卷载唐铁鉴二十一器，第十器八角七星八卦鉴，形制于此合符。博古多系月形，重三斤七两。此鉴重今市称十五两半，审其制，应更在唐前，鼻瘦与《博古图》中肥大有别，的系汉时物。《博古图》所载之鉴，乃唐人摹汉铸造耳。道光辛卯（1831）辜月游寓禾中，下榻姚明经六榆先生墨林如意之室，且示此竟，借拓数纸，以志心赏。武原勾膝邨农马宗然。^[2]

两拓题记中“姚氏宝甌堂”之姚氏与“姚明经六榆先生”，为同一人。那么，《周尊全形拓》中的“鸳鸯湖畔”是否也是指姚六榆^[3]处呢？此为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性是，在该角全形拓像的左下钤有“嘉禾郭氏止亭所藏”（白文）收藏印一枚，按张廷济所言，如果此器已归方惟祺，那么为什么郭氏还要在此拓上钤印呢？所以此拓是否为还在郭氏收藏时期所拓的呢？那样，该拓的时间就要大大推前了，至少是在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冬日之前。

上述反复地读拓及跋，无非是想证明钱寄坤或马起凤的全形拓的实践行为发端于道光初年。然而，比起将其二人作为全形拓创始人这样的英雄式人物推出，此段我更想阐述一个事实，在嘉兴府所辖之域，擅拓者并非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在这个不大但金石之风极盛的地区，不仅有着钱寄坤、马起凤等一众早期全形拓实验与实践者，亦有着六舟以及其他金石擅拓者，不仅在进行着从“分纸”到“整纸”的全形传拓研发，亦将这一最新的拓器技艺和观念远播他乡。

[1] （清）马起凤：《周尊全形拓》题跋右，泰和嘉成2016年春拍。

[2] （清）马起凤：《鉴拓》题跋，朵云轩1999秋拍。

[3] 姚观光，字六榆，室名宝甌堂、墨林如意室，清浙江嘉兴人。富收藏，尝辑有《汉铜印选》。

二、陈菽园与张受之

张廷济所藏立轴《周（诸女方）爵全形拓并题》（图10），不仅是吉金全形图像与金石考释品鉴的最佳案例，同时也是研究早期全形拓发展的关键钥匙。开启这扇神秘之门的密码就隐藏在此爵拓的左下方张廷济的一段题跋中：

甫获是爵，陈菽园剪纸分拓，拈合成图，装为清供阅数年。胡裕昆摹其图，登之石。去年冬仲，吴厚生携石本索书其侧，今年夏，吴以镌东里润色帖，又来余斋显之摹古金石刻之。室张受之，辛，有为余以整楮精拓，不事连缀，天然图画，修短纵横，不爽分寸，远出陈分拓本上，即对此图已足耽玩。^[1]

在该段陈述中，张廷济共提及四位人物——陈菽园^[2]、胡裕昆、吴厚生、张受之^[3]，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吉金图像的表现方法。其中，胡裕昆与吴厚生是摹图刻石；而陈菽园与张受之则是以拓取像，即全形拓。具体到全形拓的方法，陈、张二人又有所不同。陈菽园的全形拓法是“剪纸分拓，拈合成图”；而张受之的拓法则为“整楮精拓，不事连缀”。

是图所见的“周（诸女方）爵全形拓”，应出自陈菽园之手。该

图的爵流、爵柱、爵尾、爵身、爵足皆清晰可辨，纹饰细密绮秀。较美中不足的是，各部位的联结处多有留白；中间鏊以及鏊与爵身的联结处，处理得还有些草率，显然有些不知该如何表现，索性做虚化处理。仔细查看拓片，隐有碎片裂痕，幸而裱工到位，使补缀处连成整体，裂缝与墨痕似有游丝续之。较令人称奇的是，碎纸的部位只涉及拓像间，旁边的纸张还是完好的，他人可在该纸上继续题跋。（图11）即便不是“整楮精拓”，但是对于当时的张廷济来说，“即对此图已足耽玩”，更是“装为清供阅数年”。



图10 张廷济藏《周（诸女方）爵全形拓》（私人收藏）



图11 《周（诸女方）爵全形拓》补缀细节

[1] （清）张廷济：《张廷济藏周（诸女方）爵全形拓并题》画心题跋左下，西泠印社：《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摺存》，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 陈峻（？—1872），字粟园、菽园，浙江海盐人，陈克明（南叔）侄，精墨拓，工制印泥并铃印。

[3] 张辛（1811—1848），字受之，浙江嘉兴布衣，张廷济侄，善墨拓与刻碑。曾刻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二疏稿。张廷济晚年制铭之器，大凡为张受之所镌刻。

类似技法的全形拓于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手拓手写原稿本中亦有所见。其前四幅商爵的全形拓（图12），所用技法与周（诸女方）爵所用的分拓连缀法如出一辙，甚至还不如周（诸女方）爵的全形娴熟。当然圆腹爵的技术难度要比方爵高。很有可能也是来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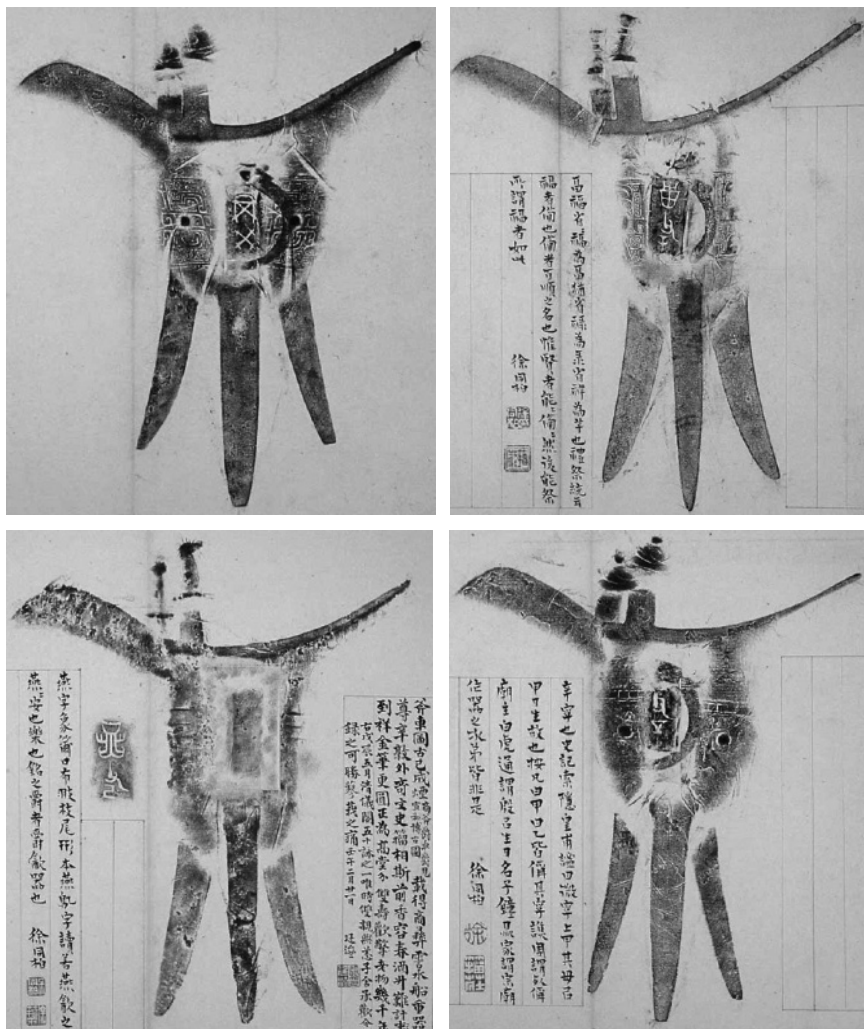


图12 商爵全形拓商举癸爵（上左）、商父辛爵（上右）、商父己爵（下左）、商父爵（下右）（《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载，日本京都大学藏）

陈菽园的手拓。这四件商爵全形，张廷济分别于道光二年（1822）二月廿一日、廿二日为其作了释文，拓像至少是早于这一时间。而从张廷济题于《周（诸女方）爵全形拓》之跋文“甫获是爵，陈菽园剪纸分拓，拈合成图，装为清供阅数年”这一句来看，周爵全形或在嘉庆末年即已完成，这四件商爵的完成时间也随之提前至嘉庆末年。

那么，陈菽园是谁呢？童衍方先生于《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摺存》一书前言中叹之：“陈菽园亦当时传拓名工，惜史未传。”^[1]笔者偶然在徐渭仁的《建昭雁足铎考》中，注意到《张

[1] 童衍方：《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摺存》序，第2页。

《开福诗》中有一条小注：

龙石偕予及吴静轩、陈粟园访其公子子鸣于虎邱孙子祠。^[1]

这一段正是张开福^[2]在介绍他与吴江杨澹（龙石）与吴静轩^[3]，以及其海盐后辈陈粟园同去拜访孙星衍儿子孙子鸣观建昭雁足鐙一事。关于陈粟园，熟悉陈介祺的各方家一定不会陌生，他是簠斋最佩服的拓者。陈介祺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为《六舟上人所作吉金全形拓》跋语时还特别提及陈南叔与陈粟园：

吉金绘画古已有之，从器上拓出而形象曲和，绘事制作不差毫厘，足资考订之真，更浑描摹之迹者，则海盐吾宗南叔先生克明始擅其长。诚前人所未有，极今日之盛事矣。先生歿，其犹子粟园峻能继之，两世皆馆东武刘燕庭廉访家，余尝遍观所拓，古雅静穆，真不啻在三代几席间也。六舟上人更以完纸成之，尤极精能，虽有巧者不能出其心思已，展册赞叹，书此归之。丙午九月癸未朔，山左陈介祺记于宝簠斋。^[4]

陈介祺这段话，有三条重要信息。第一，陈南叔^[5]与陈粟园叔侄二人都是嘉兴海盐人；第二，陈粟园的全形拓技术承自家叔陈南叔克明；第三，六舟以完纸拓全形，言下之意即陈粟园叔侄二人使用的是分纸技术。陈粟园和陈南叔的生平都不好找，尤其是生卒年。陈介祺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二日致吴云书：“廿年前所著《簠斋印集》，仅成十部。友人贖资赠粟园亡友，每部十金或十余金不等，纸与印泥不与焉。阅八月乃毕，非粟园静专，不能就也。”^[6]按此，陈粟园卒年在同治十一年（1872）。而陈介祺《簠斋印集》自序中云：“庚戌夏，海盐吾宗粟园翁峻移榻敝斋。”^[7]称其为粟园翁峻，年纪恐上五十。故推测，陈粟园年纪与马起凤差不多。陈南叔于道光初年即已受雇于刘喜海府上；其没后，陈粟园继之，并与张开福于道光末年共为刘喜海监刻《三巴耆古志》。

从中大致可以判断，陈南叔约与张开福、钱寄坤同辈，而陈粟园年龄大致与马起凤相仿。另外，张开福、钱寄坤、马起凤，以及陈南叔、陈粟园叔侄都是海盐人氏，而后四人皆为擅全形拓者。同一时期、同批友朋、同种拓法，不知陈粟园、陈菽园是否为同一人呢？其实菽、粟二字发音

[1] 张开福：《张开福诗》，徐渭仁：《建昭雁足鐙考》卷2，《随轩金石文字九种》，清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同治七年（1868）重修本，第6页a。

[2] 张开福，生卒年不详，浙江海盐人，张燕昌之子，清后期浙江著名竹雕刻家，撰有《山樵书外纪》。

[3] 吴志恭，字寅伯，号仙壶、静轩居士，吴门（今江苏苏州）人，与吴让之、杨龙石等友善，著《萍香本谢吟草》。

[4] （清）陈介祺：《六舟上人所作吉金全形拓》跋，《六舟手拓铜器拓本》，[日]木鸡室藏本，陆明君：《陈介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5] 陈克明，字南叔，清浙江海盐人。布衣，刘喜海西宾。性高洁，好吟咏，画山水、仕女，无不精妙。刘喜海尝记述：“余癖金石，曾积五千通，录为《金石苑》。海盐陈南叔克明布衣，尝为余手拓泉苑。”

[6] （清）陈介祺：《致吴云书》，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二日，《簠斋尺牋》，十二册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本1919年。

[7] （清）陈介祺：《簠斋印集》自序，铃印稿本，1644—191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1页b—第2页a。

相近，尤其是浙江人，应该分不出区别；而从字义来讲，“菽粟”常连在一起通指粮食，即豆子与小米。至此，我以为，张廷济所指的陈菽园即陈介祺推崇备至的陈粟园。

当粟园还在刘喜海府上时，即与陈介祺书信往来，并呈上其各色拓本。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廿四日陈粟园致陈介祺书函，其主要内容是应簠斋所嘱而寄拓本数件。函中云：

属拓各件，黎鼎仅有此一纸，然以先生之精鉴能无割爱耶！孟鼎近闻携至三原，尚不难购一精拓。旧藏一纸下半尚不大漫漶，兹亦检出奉上。泥印各品，惜拓之不佳，姑且呈览。至汉印近来所得甚少，就畷今所存者奉去拓本一纸，请即赐教。古币刀，汉泉随后再拓。燕翁不富于今，而富于古，然一载未尝晋省所获亦属寥寥。遇有精品，遵即拓寄。兹乘人便，肃此奉复。^[1]

在粟园寄给陈介祺的这批拓本中，从黎鼎、孟鼎、泥印各品，到自存汉印等各种，其中有粟园自拓，亦有其旧藏，且允诺随后再拓古币刀、汉泉，以后“遇有精品，遵即拓寄”。难怪陈介祺在致六舟跋语中赞誉陈粟园：“余尝遍观所拓，古雅静穆，真不啻在三代几席间也。”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夏，已从刘喜海处辞聘的陈粟园移榻陈宅，助簠斋铃拓编次《簠斋印集》，历八月余，第二年完成。想必在这一年中，编制《印集》以外，就传拓问题多有探究，体会颇深。

咸丰元年（1851）六月，粟园归海盐故里，陈介祺嘱托带上所藏吉金拓本一百三四十种，求徐同柏考释。咸丰二年（1852），“正月陈粟园将再入京”，徐同柏亦修书委托其回复陈介祺，并呈上考释十种。粟园这次进京，即为初拓重器毛公鼎。其时，他用分纸法解决了毛公鼎因鼎内结构拘谨深陷，全部文字铸造在一个凹面上很难摹拓的难题。咸丰三年（1853）秋，粟园又归乡里，并带回毛公鼎拓本，请徐同柏考释。对于从不将毛公鼎拓本公开的陈介祺来说，这亦是对金石前辈徐同柏与粟园最大的信任与敬意。^[2]

陈粟园的传拓方法及风格深得陈介祺所好，“若解事而人又稳妥静细，则粟园后无其人矣。”^[3]其之于簠斋日后总结经验，编写出两部传拓工艺专著——《传古别录》《传碑拓碑札记》，不无贡献。在这些著作中，簠斋总结出了许多摹拓技术要领，嘉惠金石界甚多。例如，《传古别录》曰：“以纸背挖出后，有花纹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不可连者，纸隔拓之。”^[4]这些都与粟园的方法要领相似。具体说来，就是将拓纸按照需要分成若干块，逐一放置到器物的相应部位进行捶拓，最后拼成全图。簠斋甚至还认为：“整纸拓者，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赏也。”粟园过世后，陈介祺常追念之，数见于其于友人之尺牍中，如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六日致鲍康书称：“尊斋必须延一能拓字之友，归来每遇此等事，辄追念粟园不置。”^[5]又于光

[1] （清）陈粟园：《致陈介祺书》，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2] （清）徐士燕：《岁贡士寿臧府君年谱》，第17页a—第18页a，《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36册，第1065页。

[3] （清）陈介祺、陈继揆编：《秦前文字之语》，齐鲁书社1991年版。

[4] （清）陈介祺：《簠斋传古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5] （清）陈介祺、陈继揆编：《秦前文字之语》，第148页。



图13 陈介祺旧藏周曾伯霏篮铭文、全形拓、张廷济题名、徐同柏之释文考证、张受之刻（上海博古斋2015年秋拍）

绪三年（1877）七月七日致吴大澂书：“古文字事亦不能理，拓友有它事或不妥而它之，印泥半年未作，成莫助之叹，追忆栗园，岂可再得？”^[1]

以上是持“剪纸分拓”法的陈粟园与陈介祺的一段交往，而持“整楮精拓”法的张受之也在其短暂人生的最后岁月，与簠斋有过纵谈金石书画的情谊。其二人最初相识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一月，张受之随张廷济次子张稚春入京应礼部试，索得徐同柏旧藏曾伯霏篮全形拓本暨手书释文之幅，赠与陈介祺。^[2]

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受之寓京，因陈介祺与其叔伯张廷济相交甚笃，故张受之充当了陈介祺与徐同柏的信使，并为陈氏拓器及刻曾伯霏篮器楛。也是在这一年，张受之与陈介祺来往频频。例如，二月二十日，陈介祺跋张受之藏《苏氏纂集集古印谱》；另《潍县陈氏旧札钞》有十一月六日张受之致簠斋书札一通，亦可从中窥其往来之信息。书云：

得来示领委即将簠、饭鬲、银片鼎共三器呈，查出余器当拓后续缴。戈二已各拓二十本，虎符一、造像一，共拓一包，先奉左右。印池付上，求惠印泥为感。汉印当待来后呈鉴。常廉使处当即往拜。簠楛略迟数日刻缴，禀与布被原包簠器奉还，另有布被昨晚又寻数次，尚未得。当待检得后即附上。专此并候崇安不尽。寿卿世叔大人尊前，愚侄辛顿首谨复。十一月六日。^[3]

此时张受之正为簠斋拓器并刻簠楛，陈介祺曾孙陈育丞曾跋此书札云：“函中所云簠即曾伯霏簠，饭鬲为新始建国长乐卫士铜饭鬲，惟银片鼎、戈、造像等不可考。考簠斋得器后，曾制一楛，受之刻之，其文为徐同柏之释文考证及张叔未题簠名，刻甚精。”^[4]（图13）

不料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张受之客京染疾病歿，年三十八岁。是年九月下浣，何绍基为张受之作传略，陈介祺为之题跋。吴俊绘《张受之小像》、陈氏跋，以及何绍基撰并书之《张受之传略》正文，摹勒上石，嵌于北京西城区达智桥松筠庵内壁间。其拓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图14）何绍基《张受之传略》云：

[1] （清）陈介祺、陈继揆编：《秦前文字之语》，第305页。

[2] （清）徐士燕：《岁贡士寿臧府君年谱》，第15页a，《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36册，第1064页上栏。

[3] 陆明君：《陈介祺年谱》，第71页。

[4] 陆明君：《陈介祺年谱》，第71页。



图14 《张受之传略》拓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道光丁未春，嘉兴布衣张辛字受之者，过京华松筠庵。庵为杨忠愍故庐，后人葺为禅院，奉忠愍祀。住持僧明基字心泉，与受之以文字相善，适忠愍九世孙承泽奉杨忠愍《谏马市》《劾严嵩》两疏草稿卷来，同人传观，商谋勒石，受之慨然曰：是吾事也。五月移寓庐，心泉扫舍洁榻几磐石以俟，受之钩墨朱奏刀，殫竭心力……讫工后越一日，为季春月朔，受之忽染忽疫，时愈时剧，剧渐甚，余与心泉为延医量药，竟不能起，以廿三日病歿，年三十有八。^[1]

陈介祺跋云：

嗚呼！受之一朴直之士耳。生執藝事以游，后附忠愍以顯。則夫世之不死，死而不死者，天之为抑人之为耶？嗚呼！受之亦可以无憾矣。平寿陈介祺题。^[2]

真是天嫉英才，张受之年仅二十即被叔父张廷济赞誉其全形拓技术为“整楮精拓，不事连缀，天然图画，修短纵横，不爽分寸，远出陈分拓本上”，惜未留下拓本传世。或许我们只能通过钱寄坤《周文王鼎全形拓》、马起凤《周尊全形拓本》的版拓，与马起凤《周鲁侯角全形拓》的早期“整纸拓”来遥想其“天然图画”的风采了。

[1] (清)何绍基：《张受之传略》拓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 (清)陈介祺：《张受之小像》题跋拓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三、再谈马起凤与六舟

道光年间的这一嘉兴早期全形拓群体对于全形拓的发展以及整个金石研究与鉴赏的意义不言而喻。只是为什么徐康在谈到全形拓技术时会特别推出马起凤呢？此时，回过来再看看徐康的行文：

“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其前提是吴门地区无人会全形拓技术。之前研究者们注意力大多放在马起凤是否为全形拓创始人，六舟技术是否受之于马起凤，而笔者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更侧重于浙禾在全形技术方面对于吴门的影响，而六舟显然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中间人。

论在吴门地区的影响力，六舟作为曾经苏州沧浪亭与杭州净慈寺住持，及其广泛的金石交游，傅岩一介偏安乡野的布衣，自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即便是在张廷济题跋《周（诸女方）爵全形拓》的道光十年（1830）九月，六舟的观后跋亦表明其刚从苏州返回：

道光庚寅八月十九日，偕江阴方子可中，从金阊归途借观于禾郡舟次以致眼福不浅，聊戏岁月归之，南屏行者六舟达受。^[1]

从其《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看，应是拓虎丘点头石北宋天圣八年王质等题名而归。那年四月，六舟曾于焦山拓周无专鼎全形。这也是其于《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中首次提到其亲拓吉金全形。事隔小半年，看到其他金石友的全形拓，写下“眼福不浅”的评价之时，不知其是否有与自己的拓法暗自相比。

可惜庚寅年的“焦山周无专鼎全形”不知所踪，或未能传世。现所能见到最早的六舟全形拓作品为1998年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的一件《焦山周鼎款识》全形（图15），上有六舟自题：



图15 六舟拓《焦山周鼎款识》全形（朵云轩1998秋拍）

焦山周鼎款识。道光甲午小春行归南屏，重至海西庵拓片。六舟并题。

右下有阮元跋：

[1] 西泠印社：《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摺存》，第3页。

焦山周鼎，余三见之矣。此图所摹丝毫不差，细审之，盖六舟僧画图木而印成鼎形，又以此纸折小之，以拓其有铭处乎，再细审之，并铭亦是木刻。所拓篆迹浑成，几于无别，真佳刻也。阮元识。此鼎图大小不爽，余曾手掇之，力不能胜也。^[1]

道光甲午为1834年，这是六舟早期以全形做拓的案例之一——在翻刻木版上椎拓，隶属“版拓”类的全形拓。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是六舟晚年回忆所写，在叙述这次传拓事件时用了“全图”二字，其曰“仍回焦山，重拓无专、陶陵二鼎全图”，而在作图题签时，用的则是“焦山周鼎款识”。这时他虽已开始以图来配合铭文的传拓，然而其意识中并未将“全形”拓视为重点。而相比较，钱寄坤与马起凤的题签就很明确，如《周文王鼎全形》《周鲁侯角全形》。

王屹峰先生曾归纳六舟的全形拓技法有五种：“第一种，直接从青铜器上椎拓全形……‘取法素描，整纸移拓’，如《古砖花供》一类。第二种也可局部直接椎拓，其他需要体现透视的部分则对照器物以摹画补全器形，如《周赧钟款识》。第三种是勾勒图形后就器椎拓重要部位再颖拓、补绘，只不过颖拓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或直接用扑子颖拓，或将纸张铺设于原器或他物上拓出效果，如《芸窗清供》《西汉定陶鼎》《周伯山豆拓本并补花卉》，还有如《彝器集屏》，其中《秦量》及《秦量反面》全形拓，根据题款可知此器乃六舟友人吴式芬得于杭州，布满铭文的腹部显然为直接就青铜器椎拓而得。第四种便是根本不存在原器，先勾勒图形，再摹拓补绘臆造之器的次要部位，最后借他器直接就器拓出主体，如捡云书屋主人所藏六舟《全形花插》图轴。第五种是木版翻刻，再器外施拓，如六舟《焦山周鼎款识》。”^[2]

上述第二、第三、第五种方法皆是拓绘结合，而第一种所举的例子《古砖花供》并非是青铜器。至少从目前存世的拓本来看，六舟的吉金全形，皆属“版拓”一类。无怪乎陈介祺在道光二十六年翻阅六舟的全形拓本，对其评价是：“六舟上人更以完纸成之，尤极精能，虽有巧者不能出其心思已，展册赞叹。”^[3]而对陈南叔与陈粟园的评价则是：“余尝遍观所拓，古雅静穆，真不啻在三代几席间也。”^[4]后来董斋在总结传拓技法时也特别强调“素处以古器平者拓之，不可在砖、木上拓”，“整纸拓者，似巧而俗，不入大雅之赏也”。^[5]为何俗呢，皆是因为非原器上拓出，不沾古气。似有其道理所在，然而事关审美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六舟最大的成就并非善拓，尽管时人是这么将其定位的，如程木庵、阮元等大藏家。实际其最具开创性的是将金石传拓与绘画联系起来，即全形拓入画，无论是其《剔灯图》《六舟礼佛图》《古砖花供》以及《百岁图轴》等都是以这样的观念所创作的，更开启了后世对于博古清供画的热潮。正是将金石传拓向书画延展，也令六舟更具有文人艺术家的气质，而非仅仅是金石传拓者、研究者

[1] 桑椹：《青铜器全形拓技术发展的分期研究》，《东方博物》2004年第3期，第34—34页。阮元题跋桑椹为释文节选，完整版参见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256页。“摹”字不知为何王屹峰释文为“摩”。

[2] 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第259页。

[3] 陆明君：《陈介祺年谱》，第66页。

[4] 陆明君：《陈介祺年谱》，第66页。

[5] （清）陈介祺：《董斋传古别录》，第7页。



图16 六舟旧藏“翺”字砖拓片
(海宁图书馆藏)

与收藏家。故此，郭玉海先生曾撰文讨论是“取象”还是“存古”，这显然是晚清全形拓的两种审美视角。^[1]

如此看来，徐康关于全形拓传承的叙述并非空穴来风。而做此大胆推测，并非意欲为徐康之言而辩护。与其说“浙禾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我更倾向于六舟和傅岩的共同兴趣在“砖兴大发”^[2]上产生了共鸣，这才有了六舟的藏砖、傅岩的椎拓，并由此诞生了《宋“翺”字砖拓》（图16）——其二人交游的唯一明证。拓中六舟铃印“海昌释达受六舟金石文字”（朱文）在先，于砚池左下角；傅岩铃印“原名宗默改曰起风”（白文）在后，于六舟印之上。估计此拓是为六舟所藏，一方面，该拓后来辗转流落到海宁后人徐蓉初^[3]手中；另一方面，如若当初是被傅岩带回的话，按他的收藏风格，十之八九会被一题再题，拓上可能早就被题满了，哪里还会有后来

吴昌硕的打趣诗呢：“砖亦翺，笔亦翺，感事诗成打草稿。”如此的诙谐调调颇有净慈寺禅宗之风。六舟藏砖，雕琢、椎拓砖砚，其《小绿天庵吟草》卷四《山野纪事诗》中录有其自作诗《磨砖作镜》并序：

余性嗜金石，集所得古砖，计五百余种，择温润者制为砚材，颜其轩曰“磨砖作镜”，聊以自警。云：马祖垂言示后人，磨砖作镜佛能成。我磨两鬓如霜雪，佛也难成砖不明。^[4]

“磨砖作镜”一典，出自宋代《景德传灯录》。怀让禅师见弟子马祖道一整日坐禅苦修，未能觉悟，便取一砖日日磨于石上。马祖道一问道：“磨砖作什么？”怀让答曰：“作镜子。”又问：“磨砖岂得成镜邪？”答：“坐禅岂得作佛邪？”马祖顿悟。如同作《剔灯图》，六舟以“磨砖作镜”为斋名，自有一番佛趣。

马起风亦有砖砚诗云：

一角残砖辟砚田，五铢文溯自新年。
汉家外戚都蠹贱，铜雀台成则古先。
烽火遭来千百春，恶名难洗彻天人。
传流艺苑同龟鉴，奚有挥毫颂美新。

[1] 郭玉海：《取象与存古——晚清全形拓的两种审美视角》，《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5期，第146—152页。

[2] “砖兴大发”语出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二十八宿井古砖拓本轴》（《赠清仪阁古砖墨本》）六舟自题。参见浙江省博物馆：《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艺术世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117页；王屹峰：《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第145—147页。

[3] 徐光济（1866—1935），徐志摩伯父，谱名义焘，字蓉初，小字祖荫，号寅庵，以字行，藏书家。

[4] （清）释达受等：《小绿天庵吟草》卷4，桑椹点校：《六舟集》，第197页。

制作精良久益坚，砖留文篆识当年。
尘来细润温如玉，书画相宜墨吐烟。
不意城东有逸民，更因金石话相亲。
君非假眼何曾识，万物呈素本海滨。

（此砖朱罽孺布衣得于海上，作砚示余，感赋）
咸丰乙卯寒露节，傅岩马起凤。^[1]

马起凤的斋名为“清逸山房”，自称“清逸山人”“逸民”，个性的确甚为野逸，观其拓上题跋，总是有草草之笔、纵意而为。而他果真是臻于隐匿于乡，沉浸于拓片之中，鲜与外界往来吗？倒是有一幅吴志恭题跋、马起凤手拓的铜镜拓片（图17），令我们看到了他与吴门地区的关联。



图17 吴志恭题跋、马起凤手拓铜镜
（孔夫子拍卖2015年）

四、结语

吴门地区，历来人才济济、文人汇聚，清代更是如此。乾嘉初期，以四王为代表的书画风格在此区域内依然是主流，而在乾嘉后期慢慢地也受到金石学潮流的影响，金石家的群体亦开始壮大。金石学家如王昶、孙星衍、钱泳、汪照、史善长、杨之灏、金式珪、曹载奎、韩崇、徐渭仁等皆来自吴门或周边地区。

一卷同为吴中文人陈小鲁手拓《汉建昭雁足铎拓本》手卷（图18）中，徐康的题跋亦书于该铎全形拓之卷尾，其时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康已过而立之岁，不知其看到此拓本是否感慨，吴中亦终有全形之拓。其言“吴门椎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虽是四十年后写于《前尘梦影录》之中，却是来自年轻时内心充满对全形椎拓渴盼的深刻印象。陈小鲁略小徐康三岁，虽然他所拓建昭雁足铎的全形技法尚处于早期，但亦不难看出其对全形传拓的探索，这也是其吴中前辈们皆无涉



图18 陈小鲁手拓，费念慈题签，翁大年题端，并刘泳之、杨澥、徐康、程庭鹭、陈克家、徐渭仁、陈寿昌、潘钟瑞、杨引传、孙传凤、江标、程秉铎、叶昌炽、胡玉缙、吴昌绶题跋《汉建昭雁足铎拓本》及跋手卷（西泠印社2015春拍）

[1] 姚涌进（蝶庵）：《十月廿三日》，新浪博客2017年12月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1c13520102x6e7.html。

足之处。我们从程木庵数次延请六舟前往歙县铜鼓庵为其传拓钟鼎彝器，继而被阮元等各藏家请嘱传拓，即略知道光年间人们对于全形传拓的好奇与赞誉。至道光中期，此法从嘉禾之地开始向外传播，除了六舟、陈粟园等传拓名家的对外发展，离浙禾相近的吴中地区自然成为最先惠及之处。在同光宣时期，更出现了像吴云、潘祖荫、吴大澂之类的金石学大家，与山左陈介祺成为继嘉禾的张廷济、徐同柏等后的金石函友。

至此，我们或可体会到徐康于《前尘梦影录》中，回忆起年少时所见证的那段全形拓起源史，其遣词是如何讲究：“浙禾”是一地域概念，而“吴门”却是个画派概念。此处亦暗指了浙禾金石圈所发起的吉金全形拓之风，对中国书画发展的方向性引导作用，即金石入画；而这一影响直至民国初年的海上画派，甚而整个近现代中国书画的变革。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